

當代中國概況

教學研究與資料處理

1949年前的歷史，過去大家接觸較多，包括自古代至中華民國的歷代治亂興衰及經濟、文化狀況。但現行的香港“中國歷史”課程綱要，從中學一年級到大學預料，均要求講授到二十世紀七、八十年代止，香港中學會考、高級程度會考“中國歷史科”的政治史部分，都增加了1949—1976年的歷史。其所涉及的時、地範圍較前複雜，呈現“一國兩地兩黨兩府兩制”的狀態。依照中四至中五的課程綱要，“當代中國之概況”的內容有：大躍進，文化大革命，當代之經濟建設（包括台灣之土改及建設）。下面擬就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課題略作分析，並談談有關資料的處理問題，敬請四方大家指正。

一、如何分析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根源、經過、分期及歷史影響？

（一）大躍進：

1. 背景：

- （1）**政治根源：**1949年全國政權易手，中共通過鎮反、三反、五反、肅反、反右，整肅了政敵，使中國大陸高度統一，毛澤東等想趁機有所建樹，勝利衝昏了頭腦。
- （2）**經濟根源：**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經過恢復國民經濟，實行土地改革及社會主義三大改造，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，全國經濟形勢好轉，毛澤東等乃好大喜功、廣事建設，想通過群眾運動來發展經濟。
- （3）**國際根源：**中共建國後，執行中蘇友好的外交政策，又進行抗美援朝，在國際上比較孤立，故想通過躍進而趕超

英、美，進一步在國際上立足。同時，又自蘇聯學得農業集體化及優先發展重工業等經驗。

- (4) **歷史根源**：中國為小農經濟作基礎的中央集權大國，具有通過國家壟斷發展經濟的歷史傳統，又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民族習性。1958年出現的大躍進，可視為秦、隋大規模建設的翻版，或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進一步試驗。

2. **內容**：1958-1959年，中共在大陸推行了所謂“三面紅旗”運動，包括：

- (1) **總路線**：全稱“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”，即“鼓足幹勁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”。
- (2) **大躍進**：農業以糧為綱，全民大搞糧食，大放畝產數萬乃至數十萬的“高產衛星”；工業以鋼為綱，1958年要生產1070萬噸鋼，土洋並舉，全民用小高爐大煉鋼鐵。
- (3) **人民公社**：1958年，中共在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建立人民公社。社員要交出剩餘的一點自留地，連私有的屋基、牲畜及林木都全部轉歸公社所有。在分配上，則實行吃飯不要錢等平均供給制。其特點是：一大二公，一平二調，一窮二白。

3. **影響**：

- (1) **經濟困難**：盲目躍進與浮誇風，使國家計劃成為空中樓閣，全國農民放開肚皮吃飯，結果造成三年之嚴重經濟困難，哀鴻遍野。
- (2) **政局變動**：毛澤東因負主要責任，不得不下“罪己詔”（向全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認錯），此後由劉少奇、鄧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，自覺大權旁落，心懷不滿，伏下未來文化大革命之契機。

- (3) **外交被動**：蘇聯赫魯曉夫公開批評中共的大躍進，中蘇關係惡化，蘇聯撤走專家及設備。同時，由於經濟困難，中共在國際上日益孤立。
- (4) **奠下基礎**：分析歷史事件有時須放長思量，一場由六億人參加的長達兩年之經濟建設運動，不可能甚麼都沒有留下，起碼奠定了初步的工業基礎。這猶如秦之萬里長城與隋之大運河。

(二)文化大革命：

1.背景：

- (1) **政治**：大躍進失敗後，毛澤東退居二線，時刻想打倒劉少奇、鄧小平等反對派，重掌失去的大權。
- (2) **經濟**：經過劉少奇、周恩來、鄧小平等的努力，全國經濟逐漸復蘇。毛澤東欲通過“四清”或“社教”運動（包括清賬目、清財物、清倉庫、清工分等“小四清”及清經濟、清政治、清組織、清思想等“大四清”，通稱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”）等來反對“三自一包”（自留地、自由市場、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），堅持“社會主義方向”。
- (3) **軍事**：毛澤東雖藉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而打倒彭德懷等，由林彪出任國防部長，但仍想繼續肅清軍中之反對派。
- (4) **外交**：毛澤東想藉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，即所謂“反修”、“防修”，一面打倒中國赫魯曉夫，一面奪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。
- (5) **思想**：自1962年起，毛澤東一再強調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”，大造革命輿論，批判“封、資、修”黑貨。為了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，又令姚文元於1965年11月發表〈評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〉，進一步批判吳晗、鄧拓、廖沫沙等“三家村”，矛頭直指北京市委。另又由林彪委託江青發表《文藝

座談會紀要》，使自己手下的文、武兩支軍隊——筆桿子與槍桿子結合。

- (6) **組織**：逐漸肅清外圍，首先打倒劉少奇一派的各個方面幹將：黨（楊尚昆）、政（彭真）、軍（羅瑞卿）、文（陸定一），即所謂打倒“彭羅陸楊”集團。此舉至1966年批判“二月提綱”而大致完成。
 - (7) **社會**：中國人之民族性固有勤勞之一面，然亦存在盲從、奴隸性，故中共長期鼓吹“馴服工具論”。凡專制集權國家，往往迷信權威，如早年法國之沙文主義、德國之納粹主義、蘇聯之布爾什維主義，由此不難理解文革中之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。
 - (8) **歷史**：凡平民起義打下的江山，開國君主往往要殘害功臣、迫害士子，古代如劉邦、朱元璋、李自成，近代如洪秀全、毛澤東皆然。而且歷代常發生的“小人”或“女人”干政，在文革中均綜合表演無遺。
2. **經過**：1966年至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分為四個大時期，每個時期又可分若干階段。
- (1) **大發動時期**：1966年5月（“五·一六通知”通過）至1966年8月（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），由正式開始到全面發動。
 - (a) 1966年5月—1966年7月：1966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通過“五·一六通知”，確定革命對象是“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”（簡稱“走資派”）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“權威”，標誌文化大革命作為政治大革命正式開始。接著北京大學張貼第一張大字報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，清華附中建立紅衛兵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》社論，電台廣播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，文革烈火燃遍全國。此後改組北京市委，劉少奇、鄧小平等派工作組至大專院校領導文

革，部分學生(造反派)反對黨委及工作組，與另一派(保皇派)衝突。

- (b) 1966年7月—1966年8月：毛澤東回北京，宣佈派工作組是“方向、路線性的錯誤”，撤銷工作組，批判壓制造反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。中共於8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，毛澤東親寫〈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張大字報〉，批判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，重排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之名次，通過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（“十六條”），毛澤東與親密戰友林彪接見紅衛兵。至此，文化大革命乃全面發動。
- (2) **大批判時期**：1966年8月（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）至1969年4月（九大舉行），主要是肅清劉少奇一派的勢力。
 - (a) 1966年8月-1966年12月：自1966年8月18日起，毛澤東、林彪等八次接見紅衛兵，官方實行停課鬧革命，令紅衛兵免費搭乘舟車，到處大串連、造反、破四舊、打砸搶，砸爛全國各地舊黨委及批判反動路線。
 - (b) 1967年1月-1968年10月：1967年1月上海王洪文等奪權，毛澤東支持，稱“一月風暴”，旋批判周恩來為後台的老幹部的“二月逆流”，全國到處出現大奪權、大批判，形成兩大派武鬥局勢。由於“文革”惡魔脫瓶而出、不可收伏，毛澤東雖號召“抓革命，促生產”也控制不了局面，出現全面內戰，乃有解放軍的“三支”（支工、支農、支左）、“兩軍”（軍訓、軍管），旋又派出工、軍宣傳隊至學校。最後於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，開除劉少奇出黨，同時再次批判“二月逆流”。
 - (c) 1968年10月-1969年4月：清除劉少奇後，到處建立老、中、青“三結合”的革命委員會取代舊的各級政府。1969年4月召

開黨的九大，肯定文革之勝利及林彪、江青等的地位，林彪破天荒地被黨章明定為毛澤東的繼承人。

(3) **鬥批改時期**：1969年4月（九大結束）至1971年9月（林彪敗亡），主要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鬥爭。

(a) 1969年4月-1969年10月：八屆十二中全會、九大一面清除劉少奇，一面批判“二月逆流”，預示接著要肅清的是周恩來等潛在的反對勢力。孰料文革派內部毛澤東與林彪已產生矛盾。九大後，表面上是鬥、批、改（建革委會、清理階級隊伍、精簡機構、整黨建黨），實際上林彪因羽翼豐滿，已醞釀提前搶班奪權。1969年10月，林彪下達“林副主席第一號通令”，號召戰備疏散，此一訊號引起毛澤東的警覺。

(b) 1969年10月-1970年8月；全國繼續鬥、批、改，幹部、知識分子紛紛下放至“五七幹校”。林彪聯合陳伯達，提出重設國家主席問題，毛澤東在1970年8月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批判了陳伯達。

(c) 1970年8月-1971年9月：廬山會議後，全國展開“批陳整風”。林彪及其子林立果密謀政變，草擬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紀要》，想暗殺毛澤東，最後暴露而出逃敗亡，是為“九·一三事件”。

(4) **批右傾時期**：1971年9月（九·一三事件）至1976年10月（十月政變），以毛澤東及江青等“四人幫”為一方，欲先後打倒周恩來、鄧小平等而未遂，文革終於結束。

(a) 1971年9月-1973年8月：九·一三事件後，全國開展“批林整風”，肅清軍中的林彪勢力。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，後在1973年8月召開的十大作政治報告。同時，毛澤東已讓鄧小平復出（1973年3月恢復組織生活及副總理職務，12月主持軍隊工作）。

- (b) 1973年8月-1975年12月：早在1973年8月十大召開前，毛澤東已提拔王洪文、使用鄧小平，準備逐漸捨棄周恩來。故1972年12月已有第一篇批孔文章出籠，1973年毛澤東、江青等逐步部署評法批儒，1974年1月正式開展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。同時，鄧小平一反“永不翻案”的誓言，開始批評文革的錯誤，令毛澤東無法容忍，並在1975年底從教育革命入手準備批鄧。
- (c) 1976年1月-1976年10月：1976年1月8日，周恩來病逝，毛澤東以華國鋒代總理，並正式開展“批鄧、反擊右傾翻案風”，導致1976年的“四五天安門運動”，結果發表兩項決議：以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、總理；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。是後又發生朱德去世、唐山大地震。9月9日，毛澤東去世；10月6日，華國鋒在葉劍英、李先念等支持下發動政變，逮捕毛澤東遺孀江青為首的“四人幫”及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等人，文革至此終於宣告結束。

3. 影響：文革“十年浩劫”影響深遠，大致可表述如下：

- (1) 政治：人權蹂躪淨盡，出現“三信”（信仰、信任、信心）危機，毛澤東威望一落千丈，黨內外出現否定毛澤東的趨向，中共威權大為削弱。
- (2) 經濟：經此浩劫，國民經濟停滯不前，國貧民窮。在六、七十年代亞洲諸小龍紛紛起飛之際，中國大陸失去有利的良機。
- (3) 文化：這場歷史上規模最鉅的文字獄，使文物古蹟圖書受到空前破壞，出版停滯，教育下降，人才摧殘。十年不招生及工農兵直接入學造成一代（十五至二十年）的“人才真空”，後繼乏人。
- (4) 軍事：部隊雖未捲入文革（除部分人員“三支”、“兩軍”外），

但深受影響，戰鬥力下降，武備陳舊落後，故在中越戰爭中表現奇差。

- (5) **外交**：十年文革使中國長期孤立益形嚴重，不啻自外於國際大家庭，故後期力謀打破困境，於是有與西方外交之突破。
- (6) **社會**：全國長期出現兩大派的武鬥，死傷不少，“派性”嚴重，有類歷代之黨爭，其冤仇、怨恨須經兩代人（約四、五十年代）方可平息。另民情由原來表面比較淳樸，轉成凶悍、赤裸裸的講求利益。出現了老紅衛兵這一批“失落的一代”、“被遺棄的一代”、“傷痕累累的一代”，或“探索的一代”。
- (7) **未來**：壞事變成好事，有負面也有正面之影響。
 - (a) 平反了三四十年來的冤獄，包括五十多萬被錯劃右派的“平反”。
 - (b) 出現了一大批不同政見者。
 - (c) 出現了“傷痕文學”、“探索理論”。
 - (d) 暴露領導人之腐化醜聞，對中國民眾理解社會黑暗、“正史不正”大有好處。
 - (e) 矯枉過正，刺激改革開放，外交在東、西方之間平衡。

二、如何從眼花繚亂的當代歷史 場面捕捉本質的規律？

俗云時勢造英雄，但個人性格也會影響歷史的進程。歷史現象千變萬化，看似偶然，但其背後多由一些客觀規律所左右。研究歷史雖可鑑古知今，但非算命，只可在較長、較大的範圍內預知或分析未來。現代中國歷史撲朔迷離，許多現象往往令人大惑不解，必須透過

現象觀其本質，尋出帶有規律性的結論來。茲列大躍進、文革歷史的部分問題於下，供大家分析、探討：

- (一) 為何中共搞了無數運動，包括大躍進之失敗、文革之浩劫，乃至六四的悲劇，而其政權尚如此鞏固，但國民黨就不行？為何中國國民黨到了台灣方推行兩黨制？中國大陸何時才會出現兩黨政治？對此如藉助於歷史，由中國的民族性、歷史傳統加以觀察，或可略明一二，例如秦之後有漢之盛世，隋之後有唐之盛世，中共亦可謂另一盛世，其統治年代似會長些（當然不排除類似唐代後期之地方割據）。
- (二) 為何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的中國大地，會出現所謂的“大躍進”？此種經濟狂熱是否會重現？中共的“大躍進”除有當時的時代背景外，與中國民族歷史社會傳統有關，毛澤東實乃農民起事後即位的“君主”，其“躍進”一方面類似秦始皇、漢武帝、隋煬帝的好大喜功、廣事建設，一方面近於洪秀全等的平均主義試驗。由於中國社會的農業基礎根深蒂固，一有合適的環境，頭腦膨脹、經濟狂熱症就可能再現。如果說，1958—1959年是“土躍進”，則近年開放改革中也出現一種“洋躍進”，想一下子造出十個、八個香港來。過去是全民大搞糧食、大煉鋼鐵，現在是全民大辦商業，如果經濟建設如此容易，無需資本積累、科技基礎、文明水準，則任何國家、民族、家庭都可一下子發達了。也許將來許多地區的一座座孤零零的“洋大樓”，也會像1958年後那一座座的“土高爐”。
- (三) 如何看待毛澤東發動文革之真實目的？是否如他自己或部分人所說的“反修”、“防修”？這方面因素自亦不可排除，但更多屬於“幌子”。其本質的用意乃排除政敵，肅清黨內反對派，奪回失去的權力，類似歷代平民皇帝開國後的殘殺功臣與大興文字獄。

(四) 為何文革之初，絕大多數的黨團員都支持劉、鄧派出的工作組及黨委，而成“保皇派”？為何毛澤東須發動紅衛兵及黨外群眾來打倒黨內的“走資派”？這方面的原因頗複雜，如：共產黨向來都講究組織紀律，一切均靠一級級地傳達，令行禁止，當時劉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，大家又有1957年“反黨”就是“右派”的教訓，自然不敢反對上級的佈置。加以許多中共幹部向來被教育成“馴服工具”，不敢獨立思考，對當時號召造反的“社論”也只敢按上級的解釋去理解。而且支部書記以上者均聽過內部文件傳達，知道毛澤東犯過錯誤、有檢討，劉少奇等恢復經濟有功。

(五) 1971年“九·一三”事件後，中共公佈了毛澤東1966年給江青的信，稱林彪為“我的朋友”云云，有人解釋這說明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有問題，把他當外人（屬“同志們，朋友們”的後者，非自己人、同志）。其實毛澤東察覺林彪有問題是在“九大”以後，否則無法解釋為何在黨章中列明林彪是自己的接班人。1966年信中的“朋友”應比一般“同志”更為親密。

(六) 文革後期，周恩來常被稱為毛澤東的“親密戰友”，但反對“二月逆流”、“批林批孔”等運動均暗中以其為攻擊對象。或謂江青等“四人幫”是反對周恩來的主謀，他們想“架空”毛澤東。此事也頗複雜，恐怕反周的真正後台是毛澤東，但永遠找不到一條要打倒周恩來的“最高指示”。猶如宋高宗、秦檜之於岳飛，韋昌輝奉洪秀全的“口諭”殺楊秀清然後被殺、後來太平天國紀念“東王升天節”一樣，“正史不正”的現象比比皆是。又如毛澤東使人在文革中大批陳毅，後來又臨時匆匆忙忙穿睡衣參加其追悼會，說“陳毅是個好同志”，致其家屬感激涕零。

(七) 文革中，全國各地各單位都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，武鬥不

斷，冤仇至深。後來雖表面上聯合，但“派性”長期存在，一派掌權即提拔本派為官、排斥另一派。此種“派性”何時休？如同歷史上漢代黨錮之禍、唐代牛李黨爭、宋代新舊黨爭、明代東林黨爭等一樣，初因政見不同而起，後成意氣用事之爭；文革中的“派性”可謂中國史上最大的黨爭，也須四、五十年即兩代人以後才會逐漸平息，即祖父的深仇大恨須至孫子輩才會淡化。

(八) 如何看待文革中全民族的“崇拜毛澤東”，以及當今復蘇的“毛熱”？世上任何一個民族，只要經濟不發展、民眾較愚昧，都會產生專制政治及盲目崇拜本民族的英雄人物，如法國的拿破侖與沙文主義，德國的希特勒與納粹主義。故文革中之崇拜毛澤東並不奇怪。至於目前的“毛熱”，乃是寄託一種對現況的不滿，把毛澤東當作一種有益無害的“神靈”而加以供奉。對比蘇聯，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之後，勃列日涅夫又把斯大林稍稍肯定一番，把“改革”的失誤歸咎於赫魯曉夫，並繼續走“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道路”，然後才有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出現。

三、如何客觀地分類處理當代中國之各種史料？

(一) 運用史料應注意的問題：

- 1、**去偽存真**：要留心摒除黨派的偏見。如中原大戰，國民黨官方以外的評述較客觀。對毛澤東、劉少奇二派的鬥爭，台灣、香港一些學者的看法較公允。對西安事變，則應考慮國民黨、共產黨及張學良三方的立場、處境之不同，來分析各個時期的說法。
- 2、**訂正史實**：梁啟超說“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，史料不具或不確，則無復史之可言”。故研究當代史，首先要訂正史實，

否則一錯百錯。

- 3、**客觀分析**：切忌主觀片面。對大陸的一切不可全盤否定，否則缺乏歷史觀。有些事件要考慮數十年乃至百年後之演變，如大躍進、文革並非全是負面的影響。有些政論家從大陸來港，往往憑個人的恩怨來寫作，須加留意。

(二) 史料分類的標準：

1、直接與間接：

- (1) **第一手**：文件，決議，報紙社論、文章，大字報，當事人的實錄、回憶或採訪文章等。
- (2) **第二手**：官方或私人的歷史著作，後人評價文章，外電報道等。

2、官方與民間：

- (1) **“正史”**：《中國共產黨三十年》、《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》以及《光輝的歷程》之類。
- (2) **別史**：私人發表的著作，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》（或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》）、《共和國風雲四十年》、《文革十年史》等。
- (3) **野史**：香港、台灣等海外流行的各種雜書，包括《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》等。

3、觀點與史實：

- (1) **觀點、史實均誤**：如《關於叛徒、內奸、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》（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）。
- (2) **觀點誤、史實正**：如1966年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是真實的，但其中稱林彪為“我的朋友”並非像有人解釋

的把林彪當“外人”。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《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，其中許多材料比較屬實，但分析有問題，仍處處站在維護黨的本身甚至毛澤東威信的立場上。

- (3) **史實誤、觀點正**：這種現象理論上不存在，但個別例子值得研究，如審查“四人幫”的罪行報告，對江青等人的部分指控及結論基本正確，他們確是“禍國殃民”，但某些材料之引用及處理不當，只歸咎於江青等人，而避諱其背後的主謀是毛澤東。
- (4) **觀點、史實均正**：利用官方公佈的史實或真正符合事實的第一手資料，加以客觀的評價。這方面有待歷史進程的考驗，海內外一切史家共同的努力，方能寫出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信史。

（原載《香港之中國歷史教學》，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；
另刊於《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》，香港學津書店2000年增訂版）